

目摇摇录

导摇言	员
第一章摇战争的性质	员
一、何谓战争	员
二、战争中的目的与手段	员怨
第二章摇战争的现实	猿园
一、对于战争的天才	猿园
二、战争中的危险和劳苦	源园
三、战争中的情报	源园
四、战争中的摩擦	源源
第三章摇战争的理论	源苑
一、战争艺术的分类	源苑
二、战争的理论	缘园
第四章摇战略	远园
一、若干一般观念	远园
二、精神力量	远园
三、军队的武德	远源
四、果敢与坚忍	远苑
五、数量优势	苑园
六、奇袭	苑源

七、谋略	苑
八、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兵力集中	苑
九、战略预备队	愿
十、兵力的节约	愿
十一、战争中的行动暂停	愿
十二、紧张与休息	愿
 第五章摇会战.....	怨
一、战斗	怨
二、战斗的意义	怨
三、决定	怨
四、对战斗的相互同意.....	苑
五、会战.....	苑
六、胜利的效果.....	苑
七、会战的使用.....	苑
八、追击.....	苑
九、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苑
 第六章摇防御	苑
一、攻击与防御.....	苑
二、在战术中的关系.....	苑
三、在战略中的关系.....	苑
四、战略防御的特性.....	愿
五、相互作用与反作用.....	苑
六、防御的方法.....	苑
七、重心.....	苑

第七章 摇攻击	员苑
一、战略攻击的性质	员苑
二、战略攻击的目标	员怨
三、攻势力量的减弱	员园
四、顶点	员园
五、敌军的毁灭	员员
六、以决战为目的的攻击	员圆
七、不以决战为目的的攻击	员缘
八、佯攻	员苑
九、侵入与胜利的顶点	员怨
第八章 摇战争与政治	员苑
一、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员苑
二、战争中各部分的互赖性	员怨
三、战争中目标的大小 所应作的努力	员园
四、以打倒敌人作为战争的终点	员源
五、以较有限的目标为战争的终点	员苑
六、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战争	员怨
七、有限目标 攻击	员源
八、有限目标 防御	员远
第九章 摇游击战	员怨
附录一 摇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员源
附录二 摇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	圆园

导摇摇言

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在军事思想史中占有一种特殊地位,姑不说是独一无二的地位。虽然其中含有大量有关18世纪初期战术原则的篇幅,那些已经不具有直接的价值,但却不应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是仅属于历史的范围。一位研究克劳塞维茨最富盛名的学者罗特费斯(戈特洛布·罗特费斯)曾经指出,他是研究战争而真正摸索到其主题之根本的第一人,而他也是采取一种对军事史的任何阶段都能适用之理论的第一人。所以,就见解和影响而言,堪称独步。假使说他的影响在今天似乎不如过去那样大,那大部分是由于其许多基本原则早已被纳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战争科学与艺术之中了。

1791年,克劳塞维茨生于马德堡(配齐格堡)附近的布格(月里),于1810年进入普鲁士陆军任见习官。他很早就参加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从1813年的莱茵河战役开始。在苦学之后,于1815年进入柏林陆军大学(即战争学院)就读。在那里他受到香霍斯特将军(耶拿战役中普鲁士败北)的注意,后者也就是普鲁士陆军的改组者。在1815年战役中,他以上尉的身份在后勤总监部(为本参谋本部的前身)服务,并充任奥古斯塔亲王(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侍从官。于奥斯塔德会战(编按:普鲁士地名,依德文原意应译为“欧尔城”,此会战发生于1813年10月18日,拿破仑的大将达弗在该地以二万六千人击败由普王亲自指挥的普军四万五千人。)后被俘,在法国和瑞士度过一年多的战俘生活。

回国后充任香霍斯特的助理并参加正在进行的陆军改革。他同时又被选派为普鲁士王储的军事教官,这位王储即为

后来统一日耳曼的第一位皇帝,威廉一世(编按:应为威廉一世之父,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当普鲁士被迫与拿破仑军事“合作”时,克劳塞维茨遂于1806年转入俄军服务。1807年他以俄国上校的身份在蒲留歇(月鲁奥)的司令部中充任联络官。1809年他做了华莫登将军(即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俄普联合兵团的参谋长。仅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之后,他才重回普鲁士陆军。1813年他充任提里曼将军(即拿破仑在普鲁士)的军参谋长,参加了李格尼(萨多)和华弗尔(辛菲)两次失败的战斗,但却不曾分享滑铁卢的最后胜利。

1815年他升任少将并被派到他的母校充任校长。但这个职务却是纯粹行政性的,所以他并无机会向普鲁士青年军官讲授其自己的战争经验和心得。所以当他写《战争论》时,不是在校长办公室内而是在其夫人的起居室内。这是一本军事哲学书,把其历史研究的结果和战争经验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观念。他在1819年离开军校到布勒斯劳(月鲁奥)去接任炮兵训练总监。

1821年格耐森元帅(即拿破仑在普鲁士)为了平定普属波兰的叛乱而组成一个军团,调他充任参谋长。不久他们两人都因染上了霍乱而病死在波兰边界上。在他突然逝世之后,其有关战争理论的著作才由其遗孀在密封着的包中发现,上面附有预言式的注记:

假使这个著作因为我的死亡而中断,则所发现的就只能称之为一大堆尚未成形的观念……足以引起无穷的误解。

尽管有这样的但书,但在他逝世之前不久,他曾经指出其著作的“基本原则”是真实的,事实上也是一种普遍的和永恒的真理,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即拿破仑在普鲁士)。他又宣称这些原则的真实性是受到其所使用方法的保

证。克劳塞维茨把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方法合而为一,他以观察(经验)为基础而进至演绎(哲学),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保证其原则的正确,因为“哲学与经验……互相保证”。此种演绎与观察的协调,即为其主要著作《战争论》的最重要特征。全书共分八篇,但克劳塞维茨认为只有第一篇的第一章可以算是已经完全定稿。第二篇到第六篇实质上可以算已经完全,但克劳塞维茨却有意加以修正,至于其余两篇则只是札记的集合而已。不过克劳塞维茨在1831年又这样写道:“即以此种不完全的形式而言”,他仍然相信该书前六篇含有“某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产生革命的基本观念”。

他花了相当长时间来比较他个人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观察,以及古斯塔夫(即瑞典译作古斯塔夫)、查理士十二世(即瑞典译作查理十二世),而尤其是腓特烈大帝(即普鲁士译作腓特烈大帝)的战史。他像约米尼(即瑞士译作约米尼)一样,但程度却稍差一点,后者(约米尼)的帮助使拿破仑的天才变得可以理解。拿破仑对于军事理论的贡献就只有一点断简残篇的记录,即他的所谓《治兵语录》(即普鲁士译作《治兵语录》),而他手下的元帅将军们没有一个人曾经对战争的指导产生过任何重要的思想系统。克劳塞维茨根本不重视那些语录,而直接去钻研拿破仑战役的历史。他对于军事史的研读广泛而渊博,尽可能采取多种不同的观点,因为他对于一般的历史和史学家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与他同时的军事思想家对于历史都采取一种不挑剔的态度,似乎认为是从阅读中获知某一特殊战役或会战的详情之后即可以产生的观察——好像有关战争指导的法则可以从史书中摘取下来。

克劳塞维茨认为只有从历史的精密分析中始能导出军事原则。他指出史学家往往以夸张和运用有关军事的史实来替其本国捧场,或为他们自己的理论提供事实证明。凭着此种对

历史及史学家的态度,他就慎重小心地构造他的战争哲学。他的主要错误是把他的研究局限在一个太狭窄的历史范围内,而对于比较方法仅作有限的应用。同时还应记着他所关心的仅为陆战以及地理上邻近国家之间的战争。他特别强调指出他的原则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它们“应教育未来战争领袖的心灵,又或在其自我教育中提供指导,但却不陪伴他走上战场”。他坚持着说,合理的理论并不能代替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由于他这样避免一般化的教条,所以才使克劳塞维茨的分析具有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素质,并且也使它在今天还甚至于变得更为重要。它是一种哲学,而不是操典。它所要求的是军人和政治家,以及一切想要了解战争的人都必须深思熟虑的。

克劳塞维茨分析的哲学实验性在其对于“绝对战争”(蔡元培译)的论著中可以找到最佳的例证。在克劳塞维茨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哲学不仅支配着德国的大学而且也支配着一般的社会生活。在其任陆大校长时,从1818年到1828年,他曾与康德(陈嘉庚译)的思想发生接触。根据其友人布兰德将军(陈嘉庚译)的说法,克劳塞维茨是基斯维特(陈嘉庚译)的门徒,后者曾向他灌输康德的哲学。依照康德的路线,他遂假定有一种先天战争形式的存在,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以其为依归。换言之,战争总体的理想在心灵上是与康德所谓“物自身”(蔡元培译)或译“事物本体”,依康德意,即“作为‘现象’的相反概念”)有关。他想把这种战争的绝对观念作为一种理想,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一切军事活动,而在《战争论》的前七篇中他都受到此种观念的导引,尽管以后他开始感到不满足。

后世的将军和政治家们由于盲目地追随克劳塞维茨某些放言高论所暗示的无限原则——例如“把调和的原则引入战

争哲学实属荒谬……战争是一种追求到其最高极限的暴力行动”。——遂已经使这种观念几乎成为现实。由于误解了他那种玄学式的推理,他们也就忽视了他所解释的“心灵在抽象推理中不可能不到极限而停止”的想法,同时更未注意到他所提出的警告:“但当我们从抽象转入现实时一切事物就都采取不同的形态。”更糟的是他们完全不理会在几篇之后出现的结论,克劳塞维茨曾在那里指出,假使对战争追求逻辑上的极限,则结果将是:

对于政治要求分量的顾虑将会丧失,手段将与目的丧失一切关系,而在大多数情况中,此种趋向于极端努力的目的将会被其本身内部力量的反对重量所摧毁。

为了区别现实战争(摩擦)与绝对战争,克劳塞维茨遂引入“摩擦”(摩擦)的观念。战争是在一种由危险、肉体劳苦、不确实性和机会所组成的空气中进行。在战争中一切事物都非常简单,但即使是最简单的事物也还是困难的,而这些困难,大部分都是无法预知或预测的,累积并产生一种摩擦,那对于暴力的绝对扩展和发泄也就构成一种反制。这些困难包括着“危险”,“肉体劳苦”,“情报”或其缺乏,以及发源于机会的其他无数小型而不可计算的环境及不确实性。这些无可避免的事物经常阻止现实中的战争接近纸面上和计划中的战争。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现实战争含有一大堆变化的和分立的事件。它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行动,因为许多的政治压力加在其领导和指导之上。而且它也从来不是一种单独的行动,因为在一次单独的会战中是不可能使用我方自己的一切兵力和武器,或者是与敌方的一切兵力和武器交战,又或是在一次行动

中包括整个国家。不过,虽然这些节制因素都是阻止趋向于绝对,但又还是另有一种升高的自然原则也同时发生作用。战争的暴力本质必然会影响交战双方的感情,因而增强斗志。所以现实战争是经常追求绝对理想但却永远不会达到它。现实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谓的“一种本身的矛盾”,那是一种“不能遵从其本身法则”的东西。仅当政治因素介入战争之后,这种矛盾才能克服。

虽然在这些方面克劳塞维茨常被误解,但亦不能完全归罪于他的门徒。他本人对于绝对战争究竟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还是仅为一种过去从未达到的现实,似乎也有一点不敢确定。虽然在《战争论》第一篇中,他曾说在现实中战争从来不可能是绝对的,但后来却又说拿破仑的战法已经相当接近绝对战争的理想。在讨论拿破仑战争之后,克劳塞维茨更进一步认为绝对战争是一种可以接近的目标。当他讨论整个战争理论时,他曾认为“战争的绝对形式应占首要地位”,凡是想从理论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的人,应该“惯于把眼光永远盯在它上面,认为它是其一切希望和畏惧的自然衡量标准”。所以,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尽量追求最大暴力的理想。不过同时他又必须认清暴力本身并非目标,否则“手段就会与目的完全丧失关系”。

因为他用“绝对战争”这个名词来形容拿破仑战争,同时在其哲学观念中又说那是一种只服从其本身“内在法则”的斗争,所以很容易被人误解。实际上,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观念是出于战争的本质,依照其定义,即为“一种以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志为意图的暴力行动”。换言之,克劳塞维茨始终认为暴力行动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从绝对战争也就引到绝对胜利的观念。克劳塞维茨的信

徒们往往误以为“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即为战争的目的。但他们却忽视了克劳塞维茨本人曾经说过：“绝对胜利实际上是极少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也并非必要条件。”不过，这又不能完全责备他的门徒，因为他本人那样重视“决定性会战”，也就几乎与他上述的说法自相矛盾。

对于其某些读者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因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介乎两次重大军事革命之间。第一是拿破仑时代，对于它克劳塞维茨也许可以算是军事解释者。他的一生经过了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末期和拿破仑战役的阶段。在这两大领袖的时代中，战争所表现的不同形式使他获有深刻印象。对于19世纪的战略家，他曾经这样写着：

（在那个时候）会战几乎是被视为一种罪恶……正规慎重的战争系统绝不会导致会战，仅仅由于犯了某种错误才会使其变得有所必要。只有知道如何进行不流血战争的将军才应受上赏，而战争理论——一种真正婆罗门教徒的工作——也就是专门设计用来教导这一点的。

克劳塞维茨提到婆罗门教徒是很有趣味的。究竟他的本意所指的是印度哲学中的非暴力观念呢，抑或是鄙视那些军事理论家为一种麻木不仁的僧侣阶级呢？关于这点我们很难断言。不过他的主旨却是提醒其日耳曼同胞：时代变了，所有政治及军事生活的条件也都会随之而变。

19世纪的日耳曼人生活在许多小国之中，那些统治者之间也偶尔进行着王朝战争。那种战争是由小型、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军人部队来进行，他们大部分都是外籍佣兵。养兵是一项很大的开销，通常都是由那些王公们自己掏腰包。打仗是一

种极大的消耗 ,部队的维持极为困难 ,所以政府和将军都尽可能避免会战以免浪费人力和物力。

基于此种事实 ,也就产生了一派军事理论家 ,其中最著名的有劳易德(亨利·杜鲁瓦,1833-1906)和比罗(亨利·比罗,1833-1906)。他们根据几何学的观念发展出一套复杂而近似荒谬的战争理论。依照这种理论 ,将军们只要能遵循其规律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样的战争是在战场上耍尽各种花枪 ,但就是不打一次决定性的会战。

自从发生了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之后 ,这种情形也就一扫而空。在拿破仑之下 ,战争变成了人民和民族的事情。人民的参加使战争中可用的手段和努力只受到国家资源和政策的限制。公民军队代替了职业军队 ,积极机动的战略代替了消极迟缓的战略。总而言之 ,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近代国家的全民战争代替了古代的王朝战争。克劳塞维茨是首先认清此种改变的第一人。

在克劳塞维茨之后 ,因为军事技术领域中的革命 ,于是更增强了“总体战争”的可能性。近代国家本身之内就具有产生总体战争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一触即发的民族感情和大量生产的经济制度都奠定了国家总动员和全民战争的基础。假使说这些因素实为总体战争之根源 ,则辞意含混极易被误解的克劳塞维茨著作也似乎同样不能辞其咎。

对于绝对战争观念的此种简略检讨 ,也就使我们了解到 ,诚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承认的 ,“要对战争艺术建立一种哲学结构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 ,他却又说 ,虽然有这样的困难 ,仍然有一些战争原则是并无任何困难即可认清的。诚如前面已经说过的 ,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所下的定义是 :“一种以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志为意图的暴力行动。”若欲划分手段与

目的,则暴力为手段,而“迫使敌人向我方意志屈服”为目的。但在可以迫使敌人实现我方意志之前,又必须先解除其武装,所以“在理论上,解除武装实为战争的直接目的”。解除敌人武装的惟一方法即为流血,这是无可避免的,不管那是如何恐怖。假使害怕流血,则结果可能比流血还更可怕。所以在战争中一切错误的最危险者莫过于允许慈悲精神干扰战争的进行。在效力的极限之内,对于指向选定目标的一切努力或手段是不应受到任何自愿的限制的。假使说文明民族不杀战俘,不毁地方,那只是因为他们对于军事目标能比野蛮人有较明智的选择,所以对于军事手段也就能作较佳的使用。因此,克劳塞维茨说:“毁灭对方的趋势实为战争观念之基础,并不因为文明的进步而有任何改变。”

迫使敌人向我方意志屈服是一种政治目的,而战争既然是由国家的兵力来执行的一种活动,所以也是“国家政策用其他手段的延续”。它不是一种个别的艺术或孤立的科学,而是一种社会活动。这是贯通克劳塞维茨全部著作的基本思想,而他的大名也经常与这种思想同为人所提及。尽管我们可以具有康德式的理想观念,但这一观念在现实的战争中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本体”。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所应打的战争种类、所应采取的战争形式和所应达到的战争热度。在决定军事行动时,政治目的固应适应所用军事工具的性质和效率,但前者的地位经常是领导,而后者则应该为追随者,因为“战争只是工具而不可本末倒置”。自然,一旦战争已经开始,由于战况的变化,政治目的也许必须加以适当的调整。但这不应是一种自动程序,即机械化地升高或降低目的以适应手段。反而言之,政治目的应“经常保持优先考虑权”,在战时情况中重要的是手段适应目的(政策),而不是目的适应手段。无论如何都

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 :即政策完全退出舞台而让军事行动唱独角戏。克劳塞维茨说 :

一言以蔽之 ,在其最高的观点中战争艺术即为政策 ,但毫无疑问 ,那是一种用枪杆的政策而不是一种耍笔杆的政策。依照此种观点 ,把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委之于纯粹的军事判断和决定 ,那是不可容许的 ,而且甚至于是有害的 ,的确 ,拿战争计划去咨询职业军人的意见是一种不合理的步骤 ,因为他们对于政府所应做的事情也许会发表一种纯军事性的意见 ;但更荒谬的是理论家的要求 ,主张把一切可用的战争工具全部摆在将军的面前 ,以便他可以替战争拟定一套纯粹的军事计划……

所不幸的是 ,在其对“绝对战争”的讨论中又有矛盾的说法 ,他指出“打倒敌人”的军事目的已经取代了“最后目的”或政治目的的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 ,德国人完全忽视了这些重要原则。从 1914 年初起 ,克劳塞维茨所斥为荒谬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 ,对于战争的一切政治甚至于经济指导都是由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统帅部来执行。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 ,在 1914 年由于侵入法国和中立的比利时 ,而终于引起英国的参战 ,其本身即为军事考虑忽视或支配政治目的的最佳例证。所谓希里芬计划者 ,是从来不曾 在 德国政府中开会讨论过的 ,也从来不曾受到德皇、首相或外长的批准。以后的无限制潜艇战役是军事措施决定政策的另一实例 ,其结果是证明违反了国家利益。

依照克劳塞维茨的见解 ,只有把战争视为一种政策工具 ,

然后才能克服其“本身的矛盾”，因为这样它所遵循的将不是纯军事法则，而是给予它以方向（指导）的政策法则。假使政策是有限的，则战争也将随着其自然的趋势而趋向于有限手段。“假使政策是强大的，则战争也将如此，而这也就可能会使战争达到其绝对形式。”战争的动机愈强烈，则也愈有实际符合绝对无限暴力抽象观念的趋势。

关于战争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克劳塞维茨说得很少。他对于战争潜力的重要性从未加以论列。

暂时撇开政策、经济和大战略的考虑不谈，所留下来的问题就是：当使用有组织的暴力以追求国家政策时，其支配的原则是什么？换言之，即什么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

从头说起，在任何战争中都有一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即为认清敌方“重心”（~~克劳塞维茨~~）之所在。重心即为对方国家组织中的某一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或社会等方面都在内——假使在这一点上被击败了，又或是丧失了有效控制，则整个国家权力结构和指导都将崩溃或受到致命的减弱。一旦当这个大战略目标固定了之后，下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管制战争计划及其执行的应为何种原则？

作为“重心”，克劳塞维茨对于敌方的武装部队是给予相当的重视——这种态度也支配其全部著作。他认为要想在战争中达到政治目标，则必须“征服和毁灭敌方的武装部队”，因为“敌方兵力的直接毁灭是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支配作用……”此种对毁灭敌方武装部队的重视是基于下述的简单三段论法：

大前提：战争中的目标为毁灭敌人的抵抗意志。

小前提：其抵抗意志主要为其武装部队的函数。

结论：所以，其武装部队必须予以毁灭。

为了说明这种理论，克劳塞维茨遂以两个角力者（憎恶部

为喻，双方都想用体力将对方摔倒，然后使其不能再抵抗。所以：“战争不过是一场大规模的决斗。”

上述三段论法的两个前提是值得加以检讨的。暗藏在大前提内的是认为应使敌方的抵抗意志完全毁灭，于是其手段即为完全毁灭其兵力。克劳塞维茨很少提倡仅用来减弱敌人意志的有限行动。此一前提把战争视为政策延长的定义似乎是有些矛盾，因为在政治领域中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目标之存在的，诚如他自己所指出，战争动机有不同的强度。他永远未能解决这两项原则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战争的目的为毁灭敌方军事权力；另一方面，军事目标必须加以剪裁以配合政治目标。在 1807 年的札记中，他曾经表示有意寻求一种解决，但在其有生之年却未能办到。

小前提似乎也有疑问。兵力的存在对于国民抵抗意志的决定程度并不像想像中那样巨大。也许更重要的是国民对战争以及指导战争者的信心。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使用完全非军事的手段来破坏甚或毁灭此种信心。由于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遂使帝俄在 1917 年崩溃，这时帝俄的军队是尚未完全毁灭。在 1945 年代后期，希特勒的政治战略就是用威胁和颠覆的手段来破坏和毁灭敌人的抵抗意志。就原则而言，克劳塞维茨对于这种战略似乎并不陌生。依照他的看法，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之前以及在战争过程之中，都有许多政治手段可以用来达到政治目标——因为并无理由认为仅由于军事行动的开始即应停止政治行动。后者与前者并不抵触。所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一套理论不曾加以明确的解释，那又并非由于缺少观念，而是在表达和风格上有所欠缺。

在其许多心理分析中，克劳塞维茨最长于分析一般军人或最高指挥官，而最不善于分析政治家和人民。在这一方面，他

与许多其他的职业军人并无太多差异。此外,他那个时代也还是在人民大规模参政之前。当然,他不可能预知那些大量说服和宣传的工具,他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不过就是传统的外交而已。在政治方面,他比较感兴趣的是权力的性质和潜力,而不是其心理学或伦理学。

除此以外,克劳塞维茨对于毁灭兵力的重视仍是发源于其认为战争是最高暴力行动的观念。因为战争就其本质而言既为最高暴力,则其打法是不应以消耗或迂回原则为主,而应以震荡(冲击)原则为主。换言之,就是猛烈打击在敌人实力的根源——武装部队——之上。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是以毁灭敌人武装部队的观念为核心。不过,此一观念又还是有重要的限制。但许多克劳塞维茨的门徒却完全忽视了这些限制之存在,他们以为毁灭敌方兵力即为胜利与和平的绝对先决条件。这种错误是很可谅解的,因为诚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指出的,职业军人这一行所要应付的多半为不确实性,所以也就会把一套精确的规律视为万应灵丹。但克劳塞维茨却早已对此种规律提出警告,只要研读其全书,即可明了他从来无意制定任何这样的原则。

克劳塞维茨对于其原则实际上又是作何解释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事力量必须毁灭,那也就是减弱到不能进行战争的状态为止”,接着他又说,“此后当我们用到‘毁灭敌方军事权力’的说法时,所应了解的即为此种意义”。此外,他又强调“会战并非仅为互相残杀,其效力是消灭敌人的勇气重于杀死敌人的士兵”,同时“精神力量的丧失即为决定的主因”。这可以表示克劳塞维茨对于“精神力量”的重视,此亦为其著作的特点之一。最后,他又宣称毁灭敌方武装部队仅为“在抽象中的战争目标”,且是“实际上很少达到的”。所以,无论在

战略或战术层面,他都不曾主张对敌方武装部队予以完全物质性的毁灭。所不幸的是,克劳塞维茨的这些限制都是在其书中较后面的部分,且是用一种哲学化的文章来说明的,因此遂使具有实际心灵的一般军人大感困惑。许多人不曾注意到克劳塞维茨是使用“毁灭”(Vernichtung)和“解除武装”(Entwaffnung)来表示一种敌方兵力不能再继续战斗的条件(情况)。有一次他曾用“击溃”(Zerschlagung)来代替“毁灭”。如果他能多用这种说法,而不用“毁灭”,则他的意义也许就可以获得较佳的表达。

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的确曾给予“决定性会战”(Entscheidungs-schlacht)以相当的重视。他所评述的这一部分是以欧陆战争为主,尤其是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在那些战争中“决定性会战”多如牛毛。假使他能多活几年,完成他的战争哲学,则毫无疑问的可以断言他对于以“决定性会战”为战争军事目标的观念是会有所修改。当他写到敌人的“重心”可能是位置在其武装部队之外时,那也就无异于暗示有时目标是可以比较有限化。举例言之,在一个内部分裂的国家中,重心即为该国的首都,而在民族战争(或游击战)中,他又认为“公众意见”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性军事目标。从其1829年的札记上看来,如果天假以年,则克劳塞维茨将会修改其对于战争典型的观念,而对于有限战争予以较多的重视。

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曾经指出政策决定所要打的战争种类,对于战争类型的选择一方面是要看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则要视所能动用的军事资源而定。不过他的许多言论却容易令人误以为国家的军事工具是经常应该配合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政治目标。

在其许多后学之中,著名的史学家戴布流克(Debus)